

□ 本报记者 蔡可心

在大多数人的记忆图景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密苏里”号上的投降仪式为终点。1945年8月15日,当时的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形式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2日,停泊在日本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在中国等受降国代表注视下,时任日本外相重光葵和军方代表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签下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落下帷幕。

然而,对于付出了巨大牺牲和代价的中国而言,她的胜利与尊严,是在其后一系列庄严而具体的受降仪式中被真正书写的。

### 何以“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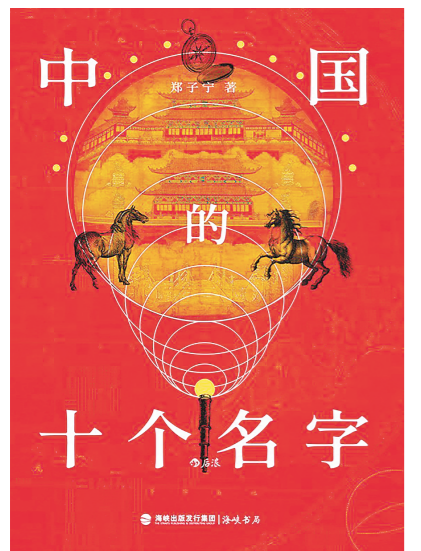
翻开《见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实录》(以下简称《见证》),可以看到一份份严谨的历史文书,这些文献我们或有耳闻,但具体内容并未被大部分人熟知,比如中美英发起的《波茨坦公告》、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在埃及首都开罗签署的《开罗宣言》,还有日本政府向中国投降降书,记录着地点和日期的缴械清单。这些文件冷静而格式化的语言,成为宏大历史图景中最坚硬的基石。它们不容辩驳地见证了一个事实:那台曾经不可一世的侵略机器,在此刻已经彻底停止运转,并必须按照战胜国的指令,完成最后的解体程序。

许多历史细节在这些原始文书中得以窥见。当时,日本天皇裕仁向全国广播的《终战诏书》篇幅并不长,却处处可见遣词造句的精心设计。这份诏书主要由彼时的日本内阁书记官长与两位汉学家共同执笔,并经过内閣大臣的多轮修订,堪称日本天皇、内閣与高层秘书反复推敲的“集体之作”。细读诏书,通篇不见“投降”二字,亦无“战败”之词,仅以中性的“终战”喻示战争结束。文中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毫无反省之意,反而继续颂扬军国主义分子的武士道精神,甚至将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美化为“为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而由此”,彻底暴露了裕仁天皇与日本政府企图篡改历史真相的政治图谋。此外,诏书还对盟军的军事行动横加指责,称“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真未可逆料”,将侵略者的身份与被侵略者的反抗倒置,混淆是非。死到临头之际,日本军国主义仍在狡辩“为东亚解放”,责怪“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

《见证》一书以简洁的笔触回顾了日本投降的全过程,并强调了两点关键认知:第一,整个进程先是日本乞降,而后盟国准降,这一次序不容颠倒;第二,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由美、英、中、苏四大国率先向世界公布,其后才有日本天皇播出所谓的“终战”诏书。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唯有服从,没有丝毫选择的余地。

书中另一珍贵之处,在于收录了大量历史现场照片。如果说文字构筑了历史的骨架,那么这些影像,则是为历史注入了血肉与温度。从日本投降的新闻报道,各地军民欢庆胜利的场景,到军令部长徐永昌代表中国政府在受降书上签字的关键瞬间,每一张定格画面,都是对文字记录最直观最有力的印证与补充。八十年后,它们依然能将那个时代的庄严、激越与屈辱、落寞,直接投射到读者心中,产生文字所不能及的震撼力。

## 看见历史中那些沉默的细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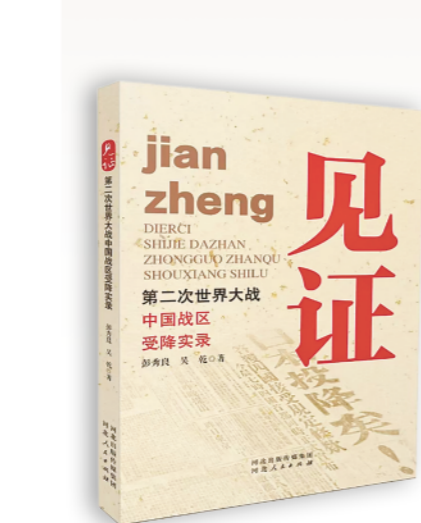


□ 冯新平

当普希金在《致恰达耶夫》中以“Китай”指代中国,当马可·波罗的“Cathay”塑造欧洲的东方想象,这些跨越时空的称谓已超越语言符号,成为文明互文的见证。郑子宁的《中国的十个名字》以语言学为工具,在三千年的文明交流地层中挖掘,将散见于青铜铭文、波斯典籍、拜占庭史书的名词碎片,拼接成跨越地理与文化边界的认知图景。这部著作不仅是对“中国”名称的考据,更是一场关于文明身份的思辨——在全球史视野下,每个称谓都是一面棱镜,折射出中国与世界相互塑造的复杂光谱。

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何尊内壁,“宅兹中国”铭文将“中国”概念锚定于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郑子宁指出,周人刻于兵器上的“中或”(“中国”早期写法),本质是征服者的政

## 看见历史中那些沉默的细节



1945年9月9日,南京受降仪式上,侵华日军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向何应钦呈交投降书。

### 一寸一寸,拾起尊严

由于历史资料的散佚与研究的不足,受降历史中的诸多细节并不为国人知晓。“受降”这一看似简单的行为,实则复杂且谨慎。

1945年9月9日9时,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南京举行。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用微微颤抖的手,分别在降书正副本上签下自己的名字,随后又从衣袋中取出圆形图章,郑重盖于名下。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瞬间,也是全体中国人扬眉吐气的庄严时刻。那一天,古城南京处处旌旗招展,好似披上节日的盛装。

关于受降地点的选定,书中也提供了清晰的脉络。历史的坐标几经流转——从江西的玉山、上饶,到湖南的芷江,最终定格于江苏南京。这座曾饱经创伤的民国首都,在反复商讨与抉择后,被赋予了见证胜利与终结战争的最终荣光。而芷江,虽与最终的签字典礼失之交臂,但它见证了洽降仪式,同样在抗战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此后,中国战区的受降工作正式展开,共划分为长沙、广州、汉口、北平等16个受降区,100处缴械点。在山东,受降仪式举行的12月27日是济南沦陷8周年纪念日。仪式结束后,受降主官李延年挥笔题写“我武维扬”四个大字,至今保存在山东省图书馆“奎虚书藏”楼。纵观各地受降,从宪兵的严格选拔、会场的庄重布置,到各方入场顺序的精心设计,都体现出对政治仪式的高度重视。也正是在这一系列严谨的规则之中,那些曾被践踏的民族尊严,被一寸一寸、一遍一遍地重新拾起,确认与重塑。

在这里,有一支英雄队伍不得不提。抗战期间,鲁南地区活跃着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鲁南军区铁道大队,也是“铁道游击队”的原型。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三天后,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竟下令,只向国民党军队投降,对其他武装可“行使自卫武力”。

此令一出,本应缴械的日军非但未立即投降,反而拒绝向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交出武器。11月的一个深夜,龟缩于临城的千余名日军乘坐列车企图南逃。铁道大队果断出击,炸毁沙沟站南韩庄段铁路,同时破坏临城站南线,将日军围困于沙沟一带。陷入孤立无援、饥寒交迫的绝境后,日军终于乞降。

1945年12月1日,一千多名日军向不足百人的八路军铁道游击队正式投降。而此次日军向地方游击队缴械投降之举,在国内抗战史上十分罕见。这段传奇,至今闪烁着信念与勇气的光辉。

### 永远值得铭记的一刻



青岛受降仪式上,长野荣二少将呈献战刀。

《见证》一书以其宏阔的视野还原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战区受降仪式的历史全景。只有目睹那些堆积如山的武器被收缴,那些曾经骄横的侵略者垂首认降,我们才能真正丈量出从“九一八事变”的烽火到南京受降的礼炮之间,中华民族所跨越的究竟是怎样一道血与火的深渊。

在那些决定民族命运的宏大仪式背后,更动人的还有那些普通人的身影。他们是这幅历史画卷中最真实、最温润的底色。例如,负责南京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会场警戒工作的赵振英,晚年回忆起“我是当时全场唯一能自由行动的人”时,仍然有些掩不住的骄傲与得意。又如,从记者黎秀石在“密苏里”号上发回的文字报道中,可以感受到盟军誓雪前仇的坚毅信念与胜利后扬眉吐气的心情。这些常被宏大叙事忽略的“小人物”,以其鲜活的感觉提醒着我们:胜利是由无数个体的牺牲与期盼共同铸就的,历史的洪流最终要落在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

因此,如今回望这段历史,在民族尊严之外,也要看到个体尊严。受降仪式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胜利,更是为千千万万个在战争中失去家园、亲人乃至生命的普通人,所讨回的一份庄严公道。它告诉我们,国家的命运与个人的福祉休戚相关,唯有国家有主权,民族有尊严,其中的个体才有真正的安全与荣光。

和平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馈赠,而是无数先烈的生命和整个民族的苦难换来的宝贵成果。受降的那一刻虽然短暂,却值得永远铭记。受降书上那些斑驳的签名,照片中那些肃穆的面容,仿佛是一种诉说:历史从未远去,而我们,永远是这段记忆的继承者与守护者。

### 相关阅读:

- 1、《中国战区受降纪实》,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 2、《二战大受降: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史料集》,朱成山著,南京出版社2015年版
- 3、《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李德·哈特著,钮先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 谁是陌生人? 我是陌生人

□ 项飙

“陌生化”指20世纪末以来的趋势:陌生人与非陌生人界限淡化,“内外有别”不再重要,人们对陌生人的戒备、好奇、关怀都趋于稀薄,“无感”成为最大感受。

亲密关系也易陌生化,少数年轻人甚至希望通过“断亲”保护自己。到最后,“陌生化”也意味着自己成了陌生人。自己不能认得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在一个到处是陌生人的社会,人们可能不安或兴奋;而在“陌生化”的境地,弥散的是孤独和迷茫,是存在意义上的不安——不知道自己该如何与世界、与自己相处。人们担心的不是一个陌生人来骗自己,而是怕自己会变成跟某一个陌生人一样,突然做出不可思议的事。

我们组织“你好,陌生人”的对话,不仅是要探讨如何接纳、理解陌生人,更重要的是如何面对“我是陌生人”的问题。嘉宾从社会科学研究、绘画、电影、社区发展、犯罪分析、人与动物关系等角度,思考陌生化背后的社会变迁,讨论可行的应对方法。我们凸显日常生活视角,希望探索“安生式”的思考方式——立足生活经验,帮助我们在陌生化的洪流中找到立足点和行动点。

我所说的“安生”,是试图结合海德格尔的“栖息”与潘光旦的“中和位育”。“栖息”是觉得自己在此刻的存在是安全、可感知和丰富的,是给自己在大地上盖一间房,呵护这个家,与世界紧密关联,同时保持开放性。“位育”是在丰富的社会关系中找到合适位置,实现“中和”,从而不断生长、勃发、安所遂生。

安生式的思考基于这样的意识:改变现状,不能靠某个行动或抉择,而必须对生活形成新的理解,从这种理解出发长出新的行为、关系和生活意味。这种理解必须直面具体现实中的纠结——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是陌生人,为什么我会下意识地和别人比较——而不是做总体的好坏判断。

它是一种“有意识化”,是行动者对社会现实进行反思,发现经验中的矛盾,是实践的内在部分。安生式的思考是开放的,需要在不同经验和想法间来回往复,不断纠正自己。它的目的不在结论,甚至没有明确方向,但每一步都力图赋予经验更丰富的意义,让想法更接地气。

但安生式的思考不是一味向环境寻求和谐。它要把保守与进取结合。保守,是认清现实,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建立立足点;进取,则是以此为基础,创造性地利用条件,不断学习,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

发展安生式思考,需意识到思考与观察、记忆、身体感知、表达、对话不可分割。

“你好,陌生人”这组对话,正是这样一个思考实践。我们邀请的五位嘉宾,都是“认得陌生人”的专家。刘小东以写实风格呈现民工、小镇青年等面目模糊的陌生人。何林皮研究保安,并分析当下犯罪案例。李一凡让我们认识“杀马特”——以奇异发型表达陌生感的低收入青年。刘悦来组织陌生人参与社区花园建设。沈志军则致力于把动物园变成以动物为中心的空间。

他们的工作不只是让陌生变熟悉,更是提出陌生的视角,把熟悉的现象重新陌生化。

我希望这组对话也提供一个思考的场景。多样视角的碰撞,构成一个可供沉浸的空间。文字版提供滞留与回视的可能,让思考真正“生根”。

(摘自《你好,陌生人》一书引言,有删减)

### 书单

《通用人工智能》刘嘉著 中信出版社  
人工智能带来的,远不止于技术革新,更是一场深刻重塑人类认知、教育与生存方式的范式转移。这场跃迁的关键,不在于技术会走多远,而在于——人类如何重新认识自我。当知识不再稀缺,学习的意义何在?当智能无处不在,智慧的栖身之所又在何处?当工具变成智能体,人的核心价值又该如何彰显?这本书以独特的跨学科视角,深入解析通用人工智能的演化路径与底层逻辑,语言如何承载认知,以及人类能力结构如何在新时代被重新定义。

《华北村治:权力、话语和制度变迁(1875—1936)》李怀印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一部研究晚清民国乡村社会经济史的学术专著。作者聚焦晚清至民国时期华北地区的乡村治理,充分利用河北省获鹿县完整丰富的历史档案,对当地村级政权、办学、地方自治以及基层行政人员的选任与日常履职,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与分析,还原最底层的乡村细节。作者跳出获鹿一隅,由获鹿及华北,由华北及中国,从地方档案的碎片中窥测近代中国乡村的社会变迁。书中基于地方民众和精英的合作与博弈,强调普通乡村的基层治理实践,重构了近代中国的乡村叙事。

《季风海域的丝银对流》[西] 欧阳安著 中信出版集团  
这是一部关于全球化初期东西方文明在海上交锋与交融的史学力作,再现了16—17世纪中国与西班牙之间的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盛况。本书引人入胜地描绘了一幅由欧亚各国的统治者、冒险家和商业移民组成的跨太平洋社区的生动画卷,驳斥了关于亚洲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扮演角色的陈词滥调,并对当今地缘政治的背景重新进行了历史定位。季风海域的丝银对流铸就了时代开始和变革的标志,也为理解早期全球化提供了重要的观察视角。  
(□记者 蔡可心 整理)

## 在语言考古中重构中国的全球叙事

治宣言:这个西部族群通过将洛阳定为“天下之中”,构建了以中原为核心的天下观。这种“中心叙事”非中华独有:古印度有“摩诃至那”(伟大的中国)尊称大唐,古希腊的“Seres”(丝国)指代东方,皆表明早期文明借命名确立自我中心。何尊铭文的价值在于,它既是中国最早的“国家认同”文字见证,也预示了后世文明对话中“命名权”的争夺逻辑——唐代景教传教士在长安立碑时,不得不使用“中国”转译基督教普世教义,无意中实现了文明话语权的首次让渡。

在“China”的词源探索中,郑子宁展现了出色的语言分析能力。他构拟古汉语发音(“秦”中古音/dzin/),揭示波斯语“Chin”、梵语“Cina”、希腊语“Thin”的语音关联,有力支持“秦音说”。但作者并未止步于此,进一步提出稻作文明假说:印度阿萨姆邦对南方族群的“China”称谓,可能源自水稻种植技术的传播,暗示海上丝路的文化交流早于陆路。这种多重证据互证的研究方法,打破了单一词源叙事,揭示“China”实为贸易网络、军事征服、技术传播共同塑造的认知集合体。正如17世纪欧洲称景德镇瓷器为“chinaware”,瓷器本身并未定义中国,而是中国的文明特质通过器物贸易被不断重塑。

辽王朝(916年建立)意外成为文明命名的重要枢纽。那律阿保机的骑兵阻断中原与西域交通后,中亚商旅只能通过契丹了解东方,“Khitay”(契丹)遂成为中国的代称。蒙古西征将这一称谓带入斯拉夫语系,最终形成俄语“Китай”。郑子宁指出,这种“语言殖民”本质是军事霸权的文化投射——正如罗马帝国推广“Christianus”(基督徒)身份,辽朝控制丝路信息通道,重构了“中国”概念。命名权的争夺在喀喇汗朝“桃花石可汗”钱币上更为微妙:中亚统治者将北魏鲜卑族名“桃花石”(Taogais)与“可汗”结合,既示中原认同,亦建草原帝国合法性。拜占庭史家西摩卡塔将“桃

花石”附会为“上帝之子统治的国度”,则暴露跨文化传播中的想象建构——真实中国在转译中被异化为神权幻象。

明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双语铭刻,是文明对话中翻译政治学的典型案例。郑子宁指出,叙利亚传教士将“弥赛亚”译为“弥施诃”,“教会”称作“寺”,这种“以佛释耶”的策略,旨在为异域宗教争取文化合法性。“大秦”称谓的选用尤为关键:它借用了汉代对罗马的旧称,又契合中国“天下观”的“远夷慕化”叙事,成为东西方文明的混合符号。这种命名的妥协与创新,在利玛窦的地理正名中达到高峰:他通过实测证明“Cathay”(契丹)即“China”(明朝),不仅终结了欧洲三百年的认知混乱,更推动东方从“传说国度”向“可认知文明体”的转变。命名的纠缠背后,是全球化初期文明认知框架的激烈碰撞。

郑子宁的学术贡献,在于将比较语言学拓展为文明互鉴的工具。他构拟原始汉语藏语系的语音演变,揭示“荆楚”与“Chin”的音系关联,将长江流域文明纳入全球认知网络;通过分析蒙古语“契丹”(Khitad)与满语“中国”(Dulimbai Gurun)的构词差异,展现草原帝国对中原文明的复杂态度——承认“中央之国”的文化优越性,同时坚守自身政治主体性。这种跨学科研究在“妙香国的胞波”一章集中体现:作者结合缅甸语构词法、《马可·波罗游记》的香料贸易记载及云南南诏碑刻,论证东南亚对中国的认知源于政治朝贡体系与民间商贸网络的共同作用。“胞波”(同胞)称谓的形成,不仅是语言接触的结果,更是文明共生的象征。

《中国的十个名字》的方法论价值,在于构建了“语言考古学”的新范式。郑子宁突破传统语言学的界限,整合考古实物(何尊、五星出东方织锦)、历史文献(《元朝秘史》、波斯《列王纪》)、民族志材料(东南亚华语方言),形成多维的文明解读体系。分析“震旦”

(C i n a s t h ā n a)梵语音译时,他既追溯佛教经典传播路径,又结合唐代长安的国际都市背景,揭示语言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的意义增殖。这种方法不仅赋予词源考证历史深度,更使语言学成为连接考古学、历史学与人类学的桥梁。

这部著作最终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文明哲学洞见:所有称谓都是流动的历史建构,不存在本质化的“中国”。波斯典籍的“Sinistan”(中国之地)蕴含粟特商队的贸易印记,日本文献的“唐土”承载律令制国家的文化印记,越南史书的“北朝”暗含小中华意识的政治定位——它们共同表明,“中国”的身份始终处于动态生成之中。郑子宁特别指出,明代《永乐大典》对“China”的多样译法,正是中华文明内在开放性的印证:它从未拒绝在他者的镜像中重新认识自身。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当下,《中国的十个名字》具有特殊现实意义。它提醒我们,真正的文明自信不在于固守“中央之国”的历史荣光,而在于理解每个称谓背后的文化基因链。当TikTok博主用“Zhongguo”演绎汉服,阿拉伯语新闻将中国与“一带一路”并置,这些称谓的当代流变,正是古代“桃花石”“摩诃至那”的现代回响。正如三千年后何尊铭文被赋予新意,中国的文明身份也在持续的跨文化对话中不断重构。

站在文明对话的新起点,郑子宁的著作成为一座语言学的巴别塔,让我们俯瞰不同文明命名与认知的图景。青铜器上的“中国”、波斯文书里的“Chin”、丝路驼铃中的“桃花石”,共同书写着一部未完成的文明叙事。它昭示着,每个称谓是文明接触的化石,每次翻译是权力关系的铭文,而一切语言考古,终是为了在流动历史中探寻人类共同的精神根基。当学会以敬畏解码他者眼中的中国,方能领悟到文明的真谛在于开放对话而非封闭自闭。  
(作者系陆军防化学院基础部副教授)

中国体育彩票 公益体彩 乐善人生